

1. 始於現代的發現和詮釋？

唐宋「古文運動」概念及其相關問題

一、前言

一般認為：「古文運動」一詞由胡適在 20 世紀 20 年代提出；¹ 30 年代，迅即為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1932)、²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³ 等著作廣泛採用，一直流行至今。目前，學術界主要從 1) 「古文運動」概念的前設，以及 2) 「古文運動」概念是否成立兩方面作探索。例如朱剛從學術史角度，析論古文運動概念與 20 世紀「白話文學史」、「文學進步論」、「駢古文優劣論」

-
1. 胡適致顧頡剛函(1923年2月24日)，《小說月報》(14卷4期，1923年4月)「通訊」欄，頁8。又，胡適《國語文學史》(1927年)分別有「韓、柳的古文運動」和「北宋的古文運動」用語。此書根據作者編寫於1921年11月至次年1月間的教材底稿修訂而成；則「古文運動」一詞也有可能早於1923年以前已見於胡適的教材。《國語文學史》引文見《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重印版)，第11卷，頁78、114。並參趙鯤：〈胡適的「古文運動」觀及其意義〉，《文藝爭鳴》(第9期，2012年)，頁52-58。趙鯤認為古文運動的好些主張與胡適的「八事」相類，此說可參。由於研究焦點不同，趙鯤尚未說明胡適「古文運動」的「革命觀」和「時間指涉」問題；本文針對這兩點作討論。
 2. 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第十一章唐代的文學運動：「古文運動有韓柳二氏的努力而達於最高的發展。」第十六章宋代的文學運動：「一代的文宗歐陽修出來做古文運動的盟主。」(上海：北新書局，1932初版，1933年5版)，頁111、169。
 3.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二十八章古文運動、第三十七章古文運動的第二幕，冊2及3(北京：樸社出版部，1932)，頁478-491、682-689。

觀念的聯繫；⁴羅聯添認為「古文運動」概念未盡準確，但不反對繼續使用這個術語；⁵小野四平、東英壽、莫道才從不同角度否定「唐代古文運動」或「唐宋古文運動」之說。⁶陳弱水、李丹、朱剛則認為「古文運動」概念尚可成立。⁷另一方面，雖然學術界已較詳細回顧了 20 世紀唐宋古文的研究史和「古文運動」概念的名實問題；但主要針對概念本身涵義立論；至於「古文運動」概念的實際應用、時間指涉、關聯詞彙等課題，仍然有待深究。主要問題包括：

1) 除「古文運動」外，學界還有「古文革新運動」、「古文復興運動」、「詩文復古運動」、「詩文復興運動」等術語，這些概念在實際使用上有何異同；由此呈現了論者對「古文運動」概念認識的哪些特徵？2) 「古文運動」固然以八大家為核心人物，可是在學術研究中有時候也有隋唐、初唐、南宋古文運動等說法；這些用語，反映了論者對「古文運動」概念怎樣的理理解？3) 80 年代迄今關於「古文運動」概念的爭議，一方面反映了運用「現代概念」詮釋古

-
4. 朱剛：〈「古文運動」覆議——研究史和問題點〉，《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27。
 5. 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載羅聯添：《唐代文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 年），上冊，頁 3-31。原題〈論唐代古文運動的幾個問題〉，韓國《中國學報》（25 輯，1985 年），頁 43-57。
 6. 小野四平：《韓愈と柳宗元：唐代古文研究序說》（東京：汲古書院，1995 年），頁 15-19、23-65；東英壽：〈歐陽脩の科挙改革と古文の復興について〉（〈歐陽脩の科挙改革與古文復興〉），原載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紀要《人文學科論集》（第 51 號，2000 年），頁 1-17，譯文見東英壽著、王振宇等譯：《復古與創新——歐陽脩散文與古文復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07-124；莫道才：〈唐代「古文運動」概念平議〉，《福州大學學報》（第 5 期，2010 年），頁 55-57、78。
 7. 陳弱水：〈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12-245；李丹：《唐代前古文運動研究》第一章第一節古文運動概念溯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9-35；朱剛：〈「古文運動」覆議——研究史和問題點〉，頁 23。

代文史可能出現的隔閡，卻也印證了現代研究的範式，確實有別於傳統文學研究，因而引伸出諸如「怎樣才是對唐宋古文正確的研究方法和恰當描述」的種種思考。本章目的並不在於論斷「古文運動」概念恰當與否，而是通過進一步梳理相關討論，盡可能廓清纏繞這個概念的問題，並針對學科畛域和學術範式的問題作出回應。

二、胡適的觀點：古文運動乃革新而非復古

「古文運動」一詞最早公開見於 1923 年 4 月《小說月報》，胡適致顧頡剛函。胡適在信中指出，研讀文學史要見出其「大運動」和「大傾向」：「大運動是有意的；如穆修、尹洙、石介、歐陽修的古文運動，是對於楊億派的一種有意的革命，大傾向是無意的，是自然的，當從民間文學白話文學裏去觀察。」⁸除「運動」一詞，胡適又以「有意的革命」來形容歐陽修等倡作古文。《國語文學史》幾次重申這個觀點：「比起那駢儷對偶的『選體』文來，韓、柳的古文運動真是『起八代之衰』的一種革命了」、或說：「古文運動是反對駢文的，是要革駢文命的」、「北宋古文對駢文的革命成功的時期……」⁹在胡適文學史的語境裏，「革命」一詞指的是甚麼？《白話文學史》引子說：「這幾年來的『文學革命』，所以當得起『革命』二字，正因為這是一種有意的主張，是一種人力的促進。」在描述元和、長慶文學發展時，胡適說：「中國文學史上……只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

8. 胡適致顧頡剛函（1923年2月24日），頁8。

9. 胡適：《國語文學史》，頁78、114-115。

的同志。」¹⁰這兩段文字中「運動」、「革命」、「革新」與「革新運動」，均指有意識的文學更革；這是「古文運動」概念剛出現時非常重要的內涵。

另外也要注意：胡適描述「古文運動」，雖也說韓、柳古文「比起那禪宗的白話來……自然不能不算是保守的文派」，¹¹但胡適未曾以「復古」觀念分析唐宋古文的變更。原因是：胡適筆下的「復古」往往帶有貶義，如說：「只有復古的風氣太深的時代，或作偽的習慣太盛的時代……才有詰屈聱牙的誥敕詔令」，¹²他抨擊「元以後之古文家，則居心在於復古」，說「吾輩所攻擊者，亦僅限于此一種『生于今之世反古之道』之真正『古文家』耳！」由於否定「復古」，胡適把論述韓、柳的焦點放在他們文章的語言——而不是「古文運動」的思想，並據此認為韓、柳「在當時皆為文學革命之人……韓柳之文在當日皆為『新文學』」。¹³又如胡適說梅堯臣詩「與其說是復古，不如說是恢復自然」。¹⁴這些文字反映了胡適刻意強調韓、柳、梅堯臣詩文近於白話，卻迴避討論其思想淵源的敘述方式。這一點，也為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所繼承，他說：「唐代的文學運動，不但不是復古運動，而且是實際的革新運動呢。」¹⁵這些討論，標誌着「古文運動」概念出現之初，即以韓、柳、歐陽修為代表人物，以及被視為更革文體的「運動」。換句話說：「古文運動」一開始主要被視為文學和文體「運動」。

對於古文運動何時發生的時間指涉問題，《國語文學史》寫的是：「到了盛唐、中唐時代，元結、陸贄、獨孤及等都是走古文的

10. 胡適：《白話文學史》，《胡適全集》，第11卷，頁218-219、555。

11. 胡適：《國語文學史》，頁78。

12. 胡適：《白話文學史》，頁245。

13. 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胡適全集》，第1卷，頁32-33。

14. 胡適：《國語文學史》，頁118。

15. 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頁113。

路的。到了韓愈、柳宗元的古文出來，這條支路丁（指古文）就成為散文的正路」；¹⁶ 似乎把元結等視為古文先導，以韓、柳為古文正途。考慮到這段文字載於《國語文學史》「中唐的白話散文」一節，胡適所說唐代古文運動較可能專指中唐。在 1923 年致顧頡剛信中，胡適舉出的古文運動人物都是宋人，排第一的是穆修，未曾提及宋初柳開。《國語文學史》則說：「宋朝提倡古文最早的，有一個柳開。」但胡適沒明言柳開參與古文運動，他說的是：「柳開之後，有穆修、尹洙、石介，都是這個古文運動的健將。」這句話究竟是指：1) 柳開和之後的穆修等同屬古文運動人物，還是 2) 柳開以後，出現了古文運動，穆修等屬其中人物？單憑此句，尚無法判斷。最後他說：「古文的『八大家』之中，六大家都出在這一個時代。古文運動從此成功。」¹⁷ 這裏「古文運動」成於宋六家的觀點十分明確。當然，胡適也沒說：古文運動「完成」於宋六家。

胡適「古文運動」概念的深遠影響在於：他把唐宋古文發展統攝在「文學史」領域，以及「運動」這個概念之內，突出了文學思潮、文人群體、文學趨勢等不同涵義，也強調了從大格局、跨時代、以及文體發展角度審視「文學」的意義。胡適把文章和書寫風格的更替視為「文學革命」，這些看法在較長時間影響了後人對唐宋古文的印象。另一方面，「運動」一詞的涵義畢竟相當寬闊，胡適把「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等現代「運動」觀念移植至古代文史研究中，加上胡適對古文運動的時間指涉雖然有傾向性——即中唐和北宋中期——但未曾就古文運動提出明確時間斷限；這些因素，使得「古文運動」研究的基本框架：例如「古文運動」何時開始？何時終結？甚至「古文運動」是否必然是個「文學運動」，也成為問題。

16. 胡適：《國語文學史》，頁 76。

17. 胡適：《國語文學史》，頁 114-115。

三、革新·復古·復興：書寫古文運動的不同焦點

胡適「古文運動」說法流行以後，有些文學史著，例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1958）修訂了胡適片面強調「古文運動」文體變化的一面，兼及思想視角，如說：「韓愈的散文運動，實包含着尊儒排佛的思想內容」、並認為柳開、穆修、石介、尹洙「鼓吹着復古運動主張文道合一的思想。」¹⁸ 無論如何，古文運動可被視為「文學」運動的這一認識，在 80 年代以前基本是學界共識。此外，胡適強調「古文運動」的「更革」，這個觀念也為學者繼承。這見於在許多著述中，「古文運動」和「古文革新運動」，往往是二而一的概念。例如游國恩等的《中國文學史》（1963）第八章：「古文運動和韓愈、柳宗元的古文」，既以韓愈為貞元時期「復古思潮」代表，同時說韓愈為了更好地宣傳政治，「自然地需要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書中又把北宋對韓、柳文風的繼續稱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¹⁹ 這兩個引例，反映古文運動「復古」與「革新」觀念兼融於 80 年代以前的文學史著。80 年代以後，大量研究唐宋古文的學者，均採用「革新運動」概念描述唐宋古文發展。如曾棗莊（1982）〈蘇洵與北宋古文革新運動〉、²⁰ 葛曉音（1983）指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這是他所領導的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的一件大事。」、²¹ 劉國盈（1984）說：「所謂古文運動，

-
18.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 年），中卷，頁 13、202。
 19. 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冊 2，頁 471；（1964 年），冊 3，頁 584-602。
 20. 曾棗莊：〈蘇洵與北宋古文革新運動〉，《四川師院學報》（第 1 期，1981 年），頁 70-75。
 21. 葛曉音：〈歐陽修排抑「太學體」新探〉，《北京大學學報》（第 5 期，1983 年），頁 62。

就是以儒道為指導思想……的一場文學革新運動」，²²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1991）謂：「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仁宗朝趨于成熟」、「歐陽修領導並完成的第二次古文運動……」、²³孫望、常國勇主編的《宋代文學史》（1996）說：「古文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歐陽修）使散文革新運動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²⁴這些例子中，「古文運動」和「散文革新運動」是同義詞。其餘例子尚有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1997）：「歐陽修主盟文壇，發起了宋代古文革新運動」、²⁵聶石樵《唐代文學史》（2002）：「（韓柳的文章）在唐代文學革新運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²⁶等等。

上述著作採用「革新運動」一語的學者，不一定都認同胡適的「文學革命」觀，但他們均認為古文家有意革新文體。另外，許多學者注意到：僅就「一新文體」這一點研究古文運動，未能賅括唐宋古文發展的全部意義。尤其是古文家在思想上強調尊崇古道、復興斯文，這些觀念很難通過「革新」一詞馬上呈現。於是在某些特定語境（通常是說明古文運動的思想特色），又有「古文復興運動」的說法。例如，陳子展〈古文運動之復興——論宋代古文〉（1933）說：在柳開的時候，「古文復興運動已經開始了。」²⁷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1961）「古文復興運動」一節說蘇綽、李諤「對於唐代

22. 劉國盈：《唐代古文運動論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77。

23.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31。

24. 孫望、常國勇：「古文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歐陽修）使散文革新運動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宋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上冊，頁17。

25. 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503。

26. 聶石樵：《唐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517。

27. 陳子展：〈古文運動之復興——論宋代古文〉，《青年界》（第4卷第4期，1933年），頁17。

的古文復興運動，卻也開闢了道路。」²⁸ 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1996）「韓愈與古文運動」一節，說韓愈「投入古文復興運動……以復興儒學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場上，他確是繼承了前人」，同時書中認為韓愈的文論和創作迭出新意。²⁹

另一個情況是把唐宋的「復古思潮」，對應當時的詩文發展，合稱「詩文復古運動」或「文學復古運動」。如陳伯海（1988）指出「注重於文藝的社會功能」，這一思想「貫串於唐代文學歷史過程中的詩文復古運動。」³⁰ 葛曉音（1989）既強調北宋詩文「革新」，同時也說北宋詩文的這些變革，是「直接繼承中唐新樂府和古文運動精神的一次大規模的文學復古運動。」³¹ 另外前引孫望、常國勇主編的《宋代文學史》，以及王水照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都可找到「詩文復古運動」或「文學復古運動」的稱謂。³² 這反映了在這兩部著作中，「革新」、「復古」概念並存不悖，卻有不同焦點。一般來說，「革新運動」更容易突出「文體」變化，「復古運動」強調思想（包括學術和文學思想）的承傳。有的學者乾脆把「復古」和「革新」兩個詞彙接連起來，合稱「復古革新運動」。如郭紹

28. 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頁376-378。

29. 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中卷，頁189。

30. 陳伯海：《唐詩學引論》（上海：知識出版社，1988年），頁64。

31. 葛曉音：〈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歷程〉，《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1989年），頁101。

32. 孫望、常國勇：《宋代文學史》：「宋代文學復古運動的首倡者柳開提出了他的道統、文統合一觀。」上冊，頁7；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宋代文學獨特風貌的形成是以北宋前期儒學復興背景下的詩文復古運動為起點的。」頁245。

虞（1959）說隋唐五代的「復古革新運動成為弧形的進展」、³³ 葛曉音（1982）認為韓柳、劉禹錫、白居易「發起了詩歌散文的復古革新運動，反對士族的藝術趣味」、³⁴ 高克勤（1996）說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是「文學上的一場復古和革新運動」、³⁵ 程杰（1996）認為「從韓愈以來的文學復古革新運動」，就詩歌而言，主要體現為古體的創獲。³⁶ 但是，也有學者，例如朱剛（2013），認為「革新」一詞是現代人對古文運動成效的概括，不符合當事者用語，就歐陽修等人的自覺追求來說，「若稱為『詩文復古運動』可能更為恰當」。這個說法比較委婉；他另一段話更直接：「歐陽修是把他們創作的詩文稱為『古詩文』的，所以應該改稱『詩文復古運動』才較合適。」³⁷ 朱剛認為與歐、蘇倡作詩文的對應概念，應以貼合古人原意為準則。和朱剛取徑剛好相反，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1991）從運動的實際表現立論，認為宋代第二次古文運動「名為『復古』，實際上是針對晚唐、五代文弊和西崑體的流行而進行的『革新』。」³⁸

在「古文運動」中加插「革新」、「復興」等用語，作用是甚麼？上述論者的共同之處是採用「運動」概括唐宋古文發展，由此突出了韓、歐一脈詩文發展的連繫，這種「整體性」是運動之為運動的基本意義。但由於「運動」屬中性詞，字面上無法呈現價值觀念和褒貶義；所以，當學者希望突出古文運動具有「更革」文體的特徵

33. 郭紹虞：《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上冊，頁143。

34. 葛曉音：〈詩人之詩到學者之詩——論韓詩之變的社會原因和歷史地位〉，《學術月刊》（第4期，1982年），頁75。

35. 高克勤：〈北宋散文簡論〉，《蘇州大學學報》（第4期，1996年），頁81。

36. 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229。

37.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頁401、418。

38.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頁32。

時（無論更革的對象是時文、駢文、綺靡空洞之文、太學體）——單純採用「古文運動」四字，就不足以迅速反映「革新」之意。與此相類，在「運動」前加上「復古」、「復興」，可更明晰地表達了興復斯文的意義，讓人一目了然地把握「古文運動」藉尚古以否定「俗下文字」，以及否定偏離聖人之道的思想。這說明：「古文運動」一詞在實際使用上，有時候需要延展（或突出）其概念，以配合各種論述需要。也可以說：上述「革新」、「復古」、「復興」運動等不同詞語組合，以及論者對「革新」用語的否定等，反映了學界對「古文運動是甚麼」以及「應當怎樣描述古文運動」這兩個最根本的問題，沒有一致共識。

四、學界對古文運動的起訖時間未見共識——這問題是否（何以）無關宏旨？

關於「古文運動」的時間指涉問題，同樣言人人殊。羅根澤《隋唐文學批評史》（1947）把李諤、王通視為隋和初唐古文運動參與者，認為「隋唐的古文運動」旨在取法周秦兩漢，打倒魏晉六朝文。³⁹ 韋政通（1978）從思想史角度，把「隋唐的古文運動」視之為儒家與佛道之爭，由此指出「古文運動者」有一個不變心願，即「希望儒家的仁義，作為支配文學的靈魂。」⁴⁰ 羅、韋二人都把古文運動上溯至隋。問題是：就隋和唐開國初年來說，很難認為已經形成了寫作古文的潮流。這樣，羅根澤和韋政通主要是把隋唐提倡古文的論者都連成一線，並通過這些人物構築「古文運動」的實體，因而得出「隋古文運動」的認識。與此不同，聶石樵（1992）認為

39. 羅根澤：《隋唐文學批評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131。

40. 韋政通：《儒家與現代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78年），頁93。

像傅奕、呂才雖可視為「唐初古文運動之端緒」，但畢竟並非有意提倡古文，要到了陳子昂才真正提倡古文，因此「陳子昂是古文的創始人。」⁴¹ 孫昌武（1984）也認為應當把陳子昂「當做『古文運動』發軔的里程碑。」⁴²

到了盛唐，由於有蕭穎士、李華、獨孤及、元結等人物，一些學者把盛唐也納入古文運動的時間域之內。如于景祥（1998）說梁肅是「連接盛唐古文運動和中唐古文運動的橋樑式人物」；⁴³ 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2005）有「盛唐——古文運動的發展期」一節。⁴⁴ 但也有學者描述古文運動時，只以中唐為起點，如錢冬父（1962）把唐代韓、柳以前視為古文運動「準備時期」，說古文運動「發生在 8 世紀至 11 世紀唐、宋時代」；⁴⁵ 劉國盈（1984）說「古文運動……發生在唐代的貞元、元和年間，而不發生在唐初，不發生在隋代」；⁴⁶ 葛曉音（1990）也只說「唐代古文運動是發生在唐德宗貞元到唐憲宗元和（785–820）這二三十年間的一次文體革命」，⁴⁷ 間接排除了初、盛唐的古文發展可納入古文運動。

中唐韓、柳倡作古文的時候屬於「古文運動」時期，這對於採納「古文運動」概念的研究者來說殆無疑問。至於晚唐，即使有學者使用「晚唐古文運動」一語，但也普遍認為晚唐古文運動走向衰歇或低潮，如姜書閣（1982）說：「在晚唐古文運動衰歇的時期，

41. 聶石樵：《唐代文學史》，頁 439。

42. 孫昌武：《唐代古文運動通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 年），頁 39。

43. 于景祥：《陸贄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116。

44. 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第 2 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7。

45. 錢冬父：《唐宋古文運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年），頁 1、5。

46. 劉國盈：《唐代古文運動論稿》，頁 1。

47. 葛曉音：《唐宋散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5。

也還有其他一些進步作家寫出不少諷刺小品」；⁴⁸ 郭預衡主編《中國歷代散文精品》(1995) 也有類似說法。⁴⁹ 至於五代，劉國盈 (1984) 說的是「古文運動便完全消聲匿跡」；⁵⁰ 劉德清 (1991) 說「古文運動幾乎銷聲匿跡」，⁵¹ 反映了論者對「古文運動是否在五代中斷」立場各異。採用「古文運動」概念的論者一般把「宋初」納入古文運動時期，這是由於柳開、特別是王禹偁確能凝聚若干古文同道，形成聲勢。陳植鏗〈略論宋初古文運動的兩種傾向〉(1984) 是採用這一概念的名篇；⁵² 郭預衡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1998) 認為歐陽修等借鑒了「唐代及宋初古文運動」的成敗經驗；⁵³ 朱剛 (2013) 說柳開、王禹偁等是「被我們稱為『宋初古文運動』代表的那些作家。」⁵⁴

比較學者使用「隋唐」、「初唐」和「宋初」古文運動三個概念，前二者較罕見，分歧也大一些；「宋初古文運動」概念則俯拾皆是，屬學界主流說法。此外也有「兩宋古文運動」、「南宋古文運動」之說。如嚴佐之 (2005) 說「兩宋古文運動得以推廣前行，科舉是一條主要途徑。」⁵⁵ 周勛初 (2004) 在回答余歷雄關於「南宋

48. 姜書閣：《中國文學史四十講》(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37。

49. 郭預衡主編：《中國歷史散文精品》：「(孫樵)是晚唐古文運動進入低潮時期的代表作家之一。」(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5年)，下冊，頁170。

50. 劉國盈：《唐代古文運動論稿》，頁321。

51. 劉德清：《歐陽修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79。

52. 陳植鏗：〈略論宋初古文運動的兩種傾向〉，《宋史研究論文集——1982年年會編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431-451。

53. 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冊3，頁62。

54.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頁416。

55. 嚴佐之：〈乾淳熙間朱呂往復信札的文學解讀與歷史解讀〉，載朱杰人、嚴文儒主編：《〈朱子全書〉與朱子學：2003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71。

古文運動」的提問時，先說「所謂『宋代古文運動』，一般是指北宋古文運動，南宋古文運動的情況較為複雜」；接着指出「南宋古文運動」不止於文學意義，而與選本、科舉的變化關係密切。⁵⁶ 與此不同，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2002) 直接說：「比及南宋，古文運動已成過去。」⁵⁷ 這又反映：無論對於古文運動的開始抑或結束，學界都沒有明確定義。當然問題也可以是：「古文運動是否必然需要開始和結束？」學界未曾嚴肅議論這個問題，是否正反映了針對實質的研究來說，古文運動明確的時間定義其實無關宏旨，因而，即使不處理這個問題，也無妨論者對唐宋古文繼續深刻討論？

除唐宋「古文運動」概念外，尚有明、清古文運動之說。金兆梓發表於 1935 年的〈歸姚以來的古文運動究竟該給以怎樣的評價〉中，以下一段話頗可細味：

古文運動……自韓退之，歷宋、元、明、清四朝，
一千年來，都時時有這種運動起伏着……時時有詩文，
便時時有古文，這就是古文運動所以曾經一千年而其名
不絕的原因。⁵⁸

56. 周勛初、余歷雄：《師門問學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32–33。

57.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冊，頁5。

58. 金兆梓：〈歸姚以來的古文運動究竟該給以怎樣的評價〉，載傅東華編：《文學百題》（上海：生活書店，1935年），頁419、425。又，錢冬父《唐宋古文運動》說：「明、清兩代所發生的幾次新古文運動……也是唐、宋古文運動的繼續，但鬥爭對象和具體情況已經不同。」頁6；台灣黃春貴先後出版《唐代古文運動探究》（台北：八德教育文化出版社，1987年）、《宋代古文運動探究》（台北：八德教育文化出版社，1987年），他在後一部著作說：「明清兩代古文運動尚有待我去挖掘、整理。」頁2。

這個觀點從最宏闊的視野，把韓愈以後的古文發展都稱為古文運動。古文運動以「異乎時文」的文體而被認識，這種描述，一方面能啟發後學對不同文體互動關係的研究，但也使「歷代古文運動」的本色和共性顯得相當含混。

通過上述從應用角度回顧「古文運動」概念的內涵，應當看到甚麼？第一，自胡適開始，「古文運動」就不是先驗的概念；論者不是首先對「古文運動是甚麼」的問題有了共識，然後順着這個共識作討論——反之，「古文運動是甚麼」這一問題隨着研究焦點各有不同，而不停被重塑，賦予新的意義。這個概念的相應內涵具有相當的彈性和延伸性。第二，在這種彈性中，始終不變的內容是「唐宋八大家」。但這個骨幹並非胡適所建立，而是北宋中期以後，歷代文評對唐宋古文發展概念整合的結果，⁵⁹ 胡適不過是使用了「古文運動」一詞，把他對古文運動的認識連接到這個傳統而已。這正是為甚麼在上世紀 20 年代「古文運動」概念剛提出，即能迅速流行，並且在當時幾乎未受質疑的原因——因為「唐宋古文運動」和「唐宋古文發展」，在許多著作裏，不過是名異實同的寫法。第三，也由於「古文運動」概念具有彈性，因此當論者嘗試追溯古文運動觀念的源頭，或說明古文運動如何發展時，才有可能把這個概念向上下延展，而無妨對於古文運動核心內容（中唐、北宋中期）的理解。即如金兆梓所認為：與古文運動概念相對的，不是中唐以前，或北宋以後的古文發展；而是「時文」或「今文」。同時也可以看到：這種追溯和延展主要是線性的。也就是，我們很少聽到像「江西古文運動」、「四川古文運動」等說法——這不是韓、歐

59. 參馮志弘：《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第一章〈歷代文評對唐宋古文運動的整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6-46。

等析論古文發展的主要方式，也不是現代學者常用的概念。⁶⁰ 第四，胡適把「古文運動」概念放置在文學史的領域裏論述，突出了古文運動屬於「文體」更革。至於「詩文革新運動」的稱謂把詩、文並舉，就更突顯了詩、文作為文學體式的意思。可是「革新」一詞，較難反映韓、歐等主張「復古」，或「復古以革新」的特色；於是又有「古文復興運動」、「詩文復古運動」概念，以之與「革新運動」的名目互相補充。這也間接反映了「古文運動」概念雖然扼要靈活，但無法迅即突出「運動」的焦點（革新）和思想特色（復古）。

五、對「運動」之說的質疑與辯護

和「古文運動」概念相比較，在 80、90 年代關於「新樂府運動」的辯論中，論者很少質疑「運動」這個現代語詞是否恰當。當時討論的焦點，是元、白等的新樂府寫作，是否構成具規模的「運動」；或討論怎樣定義「新樂府運動」概念。如羅宗強（1985）認為元、白既未能堅持創作新樂府，當時響應他們的人也不多，「很難說是有意發展這樣一個『運動』……很難說存在過作為一個文學運動通常所必然表現出來的文學思潮」；⁶¹ 這段話間接說明「文學運

60. 地域因素與古文運動關係的研究例如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第十一章北宋詩文革新的地域因素，頁 290-321；馮志弘：《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第八章、第九章，討論江西文風概念和四川仕風的部分，頁 220-248。筆者曾通過學術及常用搜尋機器（讀秀、Google、百度），嘗試尋找「江西古文運動」、「四川古文運動」的語例，尚無發現。這可能是筆者疏漏，但似乎也反映這些說法比較罕見。[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24 日]。

61. 羅宗強：〈「新樂府運動」種種〉，原載《光明日報》（1985 年 11 月 19 日）「文學遺產」，收於羅宗強：《因緣集：羅宗強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86-190。

動」須符合具發展意識，以及形成風氣這兩個標準。王運熙（1991）認為中唐只有元、白、李紳三人自覺地互相唱和，「始終沒有形成一個人數眾多，聲勢強大的創作流派，像古文運動那樣。」⁶² 句中把唐代新樂府寫作和韓、柳等倡作古文作比較，通過這一對照，王運熙尤其認為後者才是名副其實的「運動」。葛曉音（1995）主張把「新樂府」定義為對杜甫以來新題樂府歌行的全面總結和提高，按這種理解，「新樂府運動」概念尚可成立，「如果一時找不到更合適的名稱，也不妨仍借用『運動』一詞。」⁶³

與此不同，80、90年代台灣、日本學界，卻對唐代或唐宋「古文運動」概念提出了一些質疑。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的幾個問題〉（1985，按：此為原題，參注5）首先界定何謂「運動」：「所謂運動，必有一個團體作有計劃的種種活動，如文字、口頭宣傳等。」然後據這一解釋，認為「唐代古文家對古文只是個別倡導而已，頂多有若干人響應附和，實在不成為什麼運動。」但羅聯添沒有因此避用「古文運動」概念來概括唐代古文發展。在他的同一篇文章中，即有「古文運動與排佛」的分題。⁶⁴ 小野四平（1995）並不否定「古文運動」概念，卻認為韓、柳倡作古文尚不足以匹配「運動」的規模，他主張

62. 王運熙：〈諷諭詩和新樂府的關係和區別〉，《復旦學報》（第6期，1991年），頁81。

63. 葛曉音：〈新樂府的緣起和界定〉，《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1995年），頁161、173。

64. 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頁16；「古文運動與排佛」分題見頁19-22。

與「古文運動」相呼應的文體變革要到歐陽修才出現。⁶⁵ 東英壽（2000）明確排除「古文運動」概念，他的論點是：1）「古文運動」概念曖昧不明，過去，這個詞彙被不加分析地搬來考察文學史；2）雖然能看出韓愈和北宋文人的聯繫，但這只是古文寫作上的影響，不能稱為「運動」；3）僅指出古文的文學特色，無法解釋「古文運動」與社會的影響，及其導入社會的過程。⁶⁶

相對於羅聯添和小野四平只針對「唐代古文運動」概念立論，東英壽把否定對象延伸至「北宋古文運動」。而且，他不僅認為「古文運動」概念不準確，更指這個概念把學者的研究引入誤區，因為「古文運動」概念讓人純粹用現代的文學（藝文）觀來析述「古文復興」內涵——而東英壽認為這種認識偏離事實。另外，近年大

65. 小野四平認為唐代文體變革「只是來自於少數人，其偶然性的因素很高……源流有多種形式」，「從駢文到古文的文體變革的這一局面，作為『古文運動』來說，其與此稱呼相符的實際內容，恐怕是到了歐陽修以後才獲得的。」〈序章・唐代古文研究への視角〉，《韓愈と柳宗元：唐代古文研究序說》，日文頁數 15，中文摘要頁數 24-25。

66. 東英壽：〈歐陽脩の科擧改革と古文の復興について〉，頁 1-17；按：東英壽在 1993 年已經提出：「僅在文學史的土壤中考察古文運動是很不夠的……僅把古文運動看作是純粹的文學運動也是極其錯誤。」見東英壽：〈行卷よりみた北宋初期古文運動について：王禹偁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国文学論集》（第 22 号，1993 年），頁 46；但在 1998 年以前，東英壽仍採用「古文運動」一詞概括北宋的古文復興。例如他在 1998-2000 年度鹿兒島大學的一項研究課題，立項名稱仍是〈北宋古文運動と科擧制度に関する研究〉（研究課題番号：10610445）；在 1999 年的文章中他再次重申：「毫無批判地用（古文運動）這個詞語來分析一千多年前的文學情勢，是無助於弄清當時的真實情況的。」見東英壽：〈北宋初期における古文家と行卷——科擧の事前運動より見た古文復興の展開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1 集，1999 年），頁 47；正文歸納文字，以及注中兩段中譯見東英壽著、王振宇譯：《復古與創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復興》，頁 107-111、20-21、23。

陸學者莫道才(2010)也提出「唐代古文運動」概念語義並不準確，並且有誇大韓、柳等倡作古文影響之嫌。他主張：「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必須(有)嚴格的內涵和恰當的外延。」⁶⁷

上述學者對「古文運動」概念提出異議，但和「新樂府運動」用語比較，目前對「古文運動」概念的否定，似乎尚不足以扭轉學界採用「運動」以描述唐宋古文革新或古文復興的習慣。前文提到羅聯添80年代以後著作，仍然不避採用「古文運動」稱謂。與羅聯添同屬臺大中文系的何寄澎在1992年出版了題為《北宋的古文運動》的專書。柯慶明在這部著作的序文說：「每個時代的主盟文壇的人物，或大或小都在從事『文學運動』。文學史重要工作之一，正在敘述探究這些大大小小的『文學運動』。」⁶⁸柯慶明的說法進一步擴充了「運動」一詞的應用範疇，即只要是文壇領軍人物，有意識地從推廣自己的文論或文風，不論大小，都可視為「運動」。又如台灣陳弱水(2009)認為從韓、柳與中唐古文家的聯繫，以及他們共同構成的潮流這兩點，可以印證「唐代古文運動」概念當可成立。⁶⁹李丹(2012)認為「天寶之風尚黨」的判語可證唐代文人團體關係密切，此外古文家們一起交流討論綱領、統一思想，藉科舉影響文風，凡此種種都具有「運動」的特點和情狀。⁷⁰朱剛指出：「運動」二字頗能反映唐宋古文轉變的人為性、不自然性，「『古文運動』之說，畢竟概括了一個實際存在的歷史現象。」⁷¹在

67. 莫道才：〈唐代「古文運動」概念平議〉，頁55-57、78。

68. 柯慶明序，見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頁1。

69. 陳弱水：〈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頁214。

70. 李丹：《唐代前古文運動研究》，頁19-35。

71.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頁23。

漢學界中，專研唐宋思想和文學的包弼德 (Peter K. Bol)、艾朗諾 (Ronald C. Egan)，在他們不同時期的著作 (包弼德 1992, 2004；艾朗諾 1984, 1994, 2006)，都曾使用「古文運動」一詞。⁷²

六、結語：被拓展的概念

總之，過去二三十年對「古文運動」概念的反思主要圍繞：1) 唐宋古文發展的特色和規模，是否匹配稱為「運動」；2) 「古文運動」概念，會不會 (或是否已經) 干擾了學界對唐宋古文發展的準確把握。有了上文的討論，就比較好回應這兩個問題。

如前說：本文主張「古文運動」不是先驗的概念，它適切與否，是「應用問題」，而不是「理論問題」。它當然是現代人的說法，所以我們無法訴諸唐宋古文家的原話，來論證它合理與否。它也不像詩歌體式和聲律，可以有明確尺度衡量對錯。有的學者檢視「運動」一詞在辭典中的意義，這固然值得參考，但從前文引述的

72. 例如包弼德認為：「古文『運動』 (Ku-wen “Movement”) 是一個文學——思想運動 (Literary-intellectual Movement)。」原文見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 中譯見包弼德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5；Peter K. Bol, “On the Problem of Contextualizing Ideas: Reflections on Yu Yingshi’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ng Daoxue”. *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34 (2004), p. 73. 艾朗諾分別在他 1984、1994、2006 年出版的專著使用「古文運動」一語 (1984: Ku-wen Movement / 1994: Guwen Movement / 2006: Ancient Style Prose Movement)。例參 *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7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3;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p. 458;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75.

不同用例可見：怎樣的規模和影響才算得上「運動」，往往只能通過實際的語境來判斷。⁷³ 這樣說，論者對於「古文運動」概念的爭議，與其說源於這個概念本身的對錯，倒不如說是由於不滿足於近百年來對「古文運動」——這個被拓展的觀念——的認識，不符合他們對唐宋古文的認知。若干學者認為排除「古文運動」概念，有助解拆人們對唐宋古文內涵及其發展「純文學」的認識；也有學者覺得這個概念現已沒有這樣的干擾，只要實事求是地把唐宋古文發展的內涵講清楚，「這個詞語還是具有讓人快速指認特定歷史現象的功用。」⁷⁴

事實是：無論是否採用「古文運動」概念，學術界已經注意到唐宋古文家所說的「文」，和現代意義的「文學」（藝文）並不完全對應。艾朗諾、包弼德、東英壽分別對歐陽修、蘇軾筆下「文」的概念做過細緻分析。艾朗諾認為：蘇軾的「文」可指文化、文藝、散文（prose），但不包括詞（宋詞）；此外他指出蘇軾最欣賞的近代「文人」不是杜甫、王維或韓愈，而是陸贄。⁷⁵ 近年出版專研唐宋古文的專著，例如馮志弘（2009）、蘇勇強（2010）、朱剛（2013）的著作，也已經愈來愈注意到除「文學」（藝文）以外，影響古文發

73. 如柯慶明說「大大小小的文學運動」，這句話不見得有違「運動」的語義。

74. 陳弱水：〈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頁 215。

75. Ronald C.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pp. 369–374; Peter K. Bol, “Su Shi and Culture”, in Kidder Smith, Jr., Peter K. Bol, Joseph A. Adler, and Don J. Wyatt., *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7–64; 東英壽：《歐陽脩古文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 年），頁 173–185。

展的外緣因素。⁷⁶可是問題尚未解決：明白了唐宋的「文」與現代的「文學」觀念有別，確可讓我們更有意識地不要把今人的觀念硬套在古文研究之上，但「古文運動」概念所以能流行近百年，其中原因，是否應能給我們更大啟發？或者說：當我們認為研究唐宋古文必須注意諸般外緣因素——這樣，就「唐宋古文運動」而言，「文學內部」的研究，意味甚麼？

1)「唐宋古文運動」不是純粹的文體更革，它也不是純美學的問題。但如果撇除「形式」和「美」來討論復古、革新思想，卻也同樣無法理解古文家何以亟欲用「文」的方式，來體現「道」。這正好印證：在唐宋政治、思想中，無處不是「文學」和「美」的蹤跡。這樣，當我們討論唐宋古文的文學特色時，其實不應只把文學、政治、社會的關係並列出來；卻是，須同時探討那些「在文學裏面」，即那些必須「通過文學形式才能表現出來」的「文學性政治」和「文學性社會」——有何特徵？2)「古文運動」通常被描述為一個線性，即順時敘述的運動，它突出了「史」的性質。這裏我想特別提出，前幾年錢穆弟子葉龍編輯其師 1955 年文學史講稿的一段話：「吾人如要講文學之變化，須先明白文學的本質；文學史講文學的演繹，即須由史的觀點轉回來講文學的觀點……如唐代韓（愈）柳（宗元）之古文運動，則單講政治背景便不夠。」⁷⁷ 錢穆以史學知名當世，同時他以大學者的眼光注意到文學有其特質，無法用文學以外的方式說明。研究古文運動，必須把這種文學內

76. 例如馮志弘《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論天聖「申戒浮文」詔、慶曆「興隆禮樂」觀念與古文觀念的聯繫，頁 148-164、183-219；蘇勇強《北宋書籍刊刻與古文運動》（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論印本傳播與古文運動之關係，頁 230-293；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論古文運動與新儒學的發展，頁 43-123。

77. 葉龍編錄：《錢穆講中國文學史》（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 年），頁 1-2。

部的特質說清楚。3) 承接第2點，中國古代、現代文學觀念雖然不盡相同，但也有所交疊。這些交疊包括：對美、感染力、語言節奏、風格與個性、聯想力、作品新意的追求。為甚麼相隔千年的古人與今人，始終認為同一篇唐代或宋代古文是好文章？他們何以擁有相近的審美眼光？通過研究這些古今文學追求的共性，當有助我們更好地掌握漢語言（或漢字）文學的特質，及其一脈相承的文學和美學觀念。⁷⁸

這樣換一個角度，或者也可以說：胡適「古文運動」概念之所以意義重大，正由於他從現代的學術視域衝擊了傳統中國文史研究的方法，使得後來學者無論順應其說抑或置疑，其實都是從不同角度豐富了後人對於唐宋古文發展的思考。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圍繞「古文運動」概念所出現的千差萬別的認識，和現代對於「文學」觀念認識的轉變，也是並行發展的。「古文運動」這個富有彈性的概念，使得論者可以按自己對唐宋古文發展的認識來充實其內涵——它提供了一個討論平台，讓我們把近百年來的「唐宋古文研究」黏附其上，這種高度概括性，是迄今「古文運動」概念始終未被取代的原因。

78.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的這段話，時刻發人深省：「傑作之所以成為傑作，就因為歷代的讀者都認為『好作品』就是那個樣子。歸根結底來說，文學上萬古不朽的美名，還是在於文學所給予讀者的快樂上，但誰又能說究竟怎樣才可以取悅讀者呢？使文學作品有別於一般作品，就在於在精神上取悅於人的聲韻、感情、風格而已。傑作之能使歷代人人愛讀，而不為短暫的文學風尚所掩沒，甚至歷久而彌新，必然具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發乎肺腑的『真純』，就猶如寶石之不怕試驗，真金之不怕火煉。」林語堂著、張振玉譯：《蘇東坡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頁11。